

# 建构国别符号学的对话空间：读王铭玉 《符号学思想论》<sup>\*</sup>

刘利刚

书名：符号学思想论

作者：王铭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 年

ISBN：9787100198745

DOI：10. 13760/b. cnki. sam. 202401019

## 一、符号操演：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

古今中外，人们对“符号”或是其所传达出的意义与效用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热爱和关注。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符号就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对象。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将病人的病症当作符号来看待，根据不同的症候来划分和定义不同的气质类型与病因，从而完善人的性格特点（如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等）；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及早期的智者学派们都曾论及符号，对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思辨以符号化的物质为前提，抽象出一系列象征系统，同时探讨意义的产生和意象、诗学等问题。东方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也由来已久，诸如原始部族的图腾崇拜、太极八卦和周易筮辞的卜算卦爻、汉字书写的历时演化、礼乐钟鸣的封建等级、名实关系的哲学争辩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符号操演。事实上，某种特有的抽象化的思考一直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当中。

虽然最开始可能没有一个对符号概念清晰的界定，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电影中红色文化的符号学研究”（21BXW093）的阶段成果。

程中，符号始终伴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不但积极、自觉和主动地使用符号、利用符号，符号也在依靠人类，或是整个文化系统，来不断彰显其价值内涵、丰富的韧性和拓扑潜质。法国新托马斯学派哲学家马里坦（Jacque Maritain）曾坦言，没有什么问题像与符号有关的问题与人类及其文明的关系那样复杂和基本的了（李幼蒸，1999，p. 1）；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2004，p. 38）也曾指出，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从这一层面来看，人就是符号化的生物。

符号是人的存在方式，搭建了我们与世界联通的渠道，丰富了事物间的联系，深化了人类社会的意义。由于符号介质的使用，人类对外界的感受远超过了现实的实体物质层面，依据符号和想象可以跳脱出原有的生活情景，让抽象的思维找到存在的依附，让传统理性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内化于意义的生产，这样，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不仅是它自身，还可以是潜在的符号表意媒介，它也能传达异于自身的他物含义。这种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演进是长足的，同样也是困难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实践，人类开始自觉挣脱实在之物的束缚与局限，发展出抽象和象征性质的符号思维。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号呢？符号学的发展当然要对符号本身的身份问题进行界定，然而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外学者们对符号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俞建章，叶舒宪，1988，p. 12）；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Peirce，1999，p. 99）；中国符号学家赵毅衡（2011，p. 27）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受的感知”；王铭玉（2004，p. 14）也给出过对符号的界定，即“符号是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等等观点不一而足。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符号现象切入角度的不同和自身学术背景的差异，符号的定义是多样的，但总体而言，都有一种对符号内核和本质的基本认识：“符号是一种替代物，能够传递本质上不同于载体物质本身的信息，并且能够为接受者所感知。”（王铭玉，2021，p. 2）

而将符号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肇兴于西方，它是以符号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然而“什么是符号学”这一本源性和本体论的问题目前还存在着争议。虽然无意标榜符号帝国主义和将符号泛科学化，但是符号学思想早已延

## □ 符号与传媒（28）

伸至人文社科诸领域，为这些学科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视角。如果从专业的学理层面考虑，符号学专门研究符号（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及其意指活动的规律。由于意义是符号研究的核心所在，因此如果我们下意识地去探究事物表征何种意义、为何有意义时，我们实质上就是在进行基本的符号学思考。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和皮尔斯二人的理论贡献。然而，由于两人身处于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语境，他们对符号的理解使用和研究基本处于“对立状态”，由此也确立了符号学的两个派别：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实用主义逻辑学。这两个派别为符号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同时为符号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夯实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号学理论也开始形成体系。

此后，符号学就在欧美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国别特色和相异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随着符号学研究在诸领域的深入、理论体系的繁杂和自身的跨学科等特点，符号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泛符号化的倾向和符号帝国主义的危险。因此，十分有必要正视符号学研究带来的新问题，即审视符号学本体的理论建构和厘清符号学思想史的脉络。

### 二、《符号学思想论》：一种异质时空下的国别符号学图景

正是基于此，《符号学思想论》一书诞生了。该书有着明确的研究目的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综而观之，《符号学思想论》一书是以王铭玉教授领衔的一批学者潜心研究写成的一部体大而思精的符号学著作。该书对法、美、俄、中的符号学思想渊源、主要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和发展趋势做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并以宏大的视野书写了人类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该书是一部符号学思想考古史和符号理论谱系学著作，它不仅着眼于符号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重新回归理论自身和符号本体问题，认识到符号学理论本身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全书依照“国家一流派—代表人物”的总体研究思路，采取归纳、描写和对比等方法，对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符号学思想进行分章研究。在每个“符号学王国”的阐述中，又以时间为线索，溯源该国符号学思想发展历程，最后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符号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挖掘和评介。可以说，《符号学思想论》一书从符号的“意义核心”出发，为读者营造了古今中外交融共生的跨时空对话空间，建构了一种异质时空下的符号学图景，让我们不仅鉴识了古今中外符号学研究的差异之所在，

还品味了国别符号学的独特之美。

纵观全书，《符号学思想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重符号学的国别研究；二是秉承史料性原则论著；三是对索绪尔/皮尔斯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四是旨在探索符号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九台起于垒土，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仰赖丰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下的符号学研究也在不断重申“回归”意识，间接说明了符号学思想基础的重要性，符号学思想史的梳理亟待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符号学自从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其研究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独特的历史人文特性产生了相异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的发展也不平衡，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大显学。然而，不难发现，在众多理论建设中，存在两个最普遍和最基础的发展模式，即索绪尔模式和皮尔斯模式。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探究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背后的潜在规则系统以及语言的结构语法，这一模式催生了结构主义，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为后来的法国符号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皮尔斯融合了实用主义和数理逻辑的思想，注重符号的逻辑功能，拓宽了符号的概念，突破语言符号的范畴，将逻辑、感知和行动当作基本的符号现象，从符指过程（或解释活动）角度出发，将符号置于与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动力关系中考察。大量的符号学理论都是在此两种模式基础上的演化，并结合一些地域文化传统发展出自身的特色。

### 三、三大国别符号学：各自具有独特的自成体系的发展路径

《符号学思想论》一书认为，在世界符号学王国中，美、法、俄三国一直以来成鼎立之势。法国的符号学吸收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探究符号的深层结构，具有鲜明的语言学特色和文学倾向。后期的解构主义思想和巴黎符号学派的成立对符号学的启蒙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的符号学传统具有广泛的综合性特征，涉及范围之广，研究领域包罗万象，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来自皮尔斯和莫里斯的实证逻辑和认知科学。俄罗斯的符号学传统具有深厚的民族特色和马克思主义积淀，以巴赫金和洛特曼为代表的符号学家们贡献了深刻的符号学思想。该书在梳理这些国家的符号思想发展时，详细考究了各国的思想发展阶段、各门学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精髓，总结了当下的发展态势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旁征博引，论述客观得当，不失偏颇，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从该书受到的启发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国家的符号学研究时，一方面要

## □ 符号与传媒（28）

厘清符号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各国研究的优点和长处，并且带着问题意识去审视这些理论，看到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为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提供服务。中国作为符号学研究的后起之秀，虽然发展历史较短，但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却孕育着非常丰富的符号学资源，了解、吸收、消化、培育这些符号学资源是我们研究符号学的必然选择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学术精神要义何在以及该如何探索独特的发展路径，也是《符号学思想论》一书的重要研究问题。

法国是世界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其宏大的学术规模和深刻的学术影响，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而且法国是唯一一个形成过符号学运动并使符号学具有较大规模的国家。法国符号学代表人物颇多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和现象学）发展的结果。法国符号学的发展，整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为结构论符号学（包括整个结构主义运动）和巴黎符号学派时期，在不同阶段，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始终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其他的人文学科不仅为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符号学的内涵。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可谓法国符号学研究的核心所在。索绪尔（2005, pp. 102 – 120）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将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聚焦于语言的任意性特质，认为意义源于对立两项之间的差异。

因此，不存在什么与生俱来的意义，意义是在差异中体现出来的，而整个系统就由符号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构成。同时，语言并非对物质世界的简单反映，它更像是一张概念地图，为我们体察外部世界设定了规范，因此对现实的感知是被语言建构出来的。另外，索绪尔所有二分性质的表述都旨在将文本与实践放在语言的框架下来审视，观察它们背后潜藏的基本结构、规则或惯例。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符号、符号系统和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就成为结构论符号学关注的重点，文化被当作一种结构集合，符号学的任务就是探究符号能指背后的语法逻辑，以及文化产品、意义产生的共同特征（王铭玉，2021, p. 89）。

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动摇，学者们不再关注和追问意义究竟是什么，转而探究产生意义的逻辑、方式和策略，也就是说转向了一种文化建构论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意义背后并不存在先验的固定的结构体系，意义始终处于流变和生成的状态。此时的研究不再过多纠缠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开始回归主体，对连续体、文本和话语展开探讨。符号并不携带清晰固定的意义，意义总是暧昧不明的，从一个能指飘向另一个能

指 (Derrida, 1978, p. 25)，并处在延异和增补的状态 (1976, pp. 43 – 50)。这相当于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让符号解释活动游走在无限的互文性当中。之后，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意指系统的一般理论，将主要研究对象投射到言语活动的意指系统和组织形式而不仅是符号本身的性质和种类，符号学成为对元语言等级系统的一种叙事化分析，将各种言语活动划入研究范围来展示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意指表达形式，从而走出了静态的语言文本，语料之外的背景也成为其考察的对象，使得符号学可能成为独立学科。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符号学研究最为活跃和最具创新力的国家。《符号学思想论》一书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全面而深刻地梳理了美国符号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根据现有文献尽可能地为我们描绘了当代美国符号学的发展全貌，并推断其将来的发展趋势。总体来看，美国符号学的边界并非有清晰明确的划定，该书告诉我们要尽可能站在世界符号学的整体观下审视美国符号学及其对世界符号学的辐射作用 (王铭玉, 2021, p. 173)。从发展阶段来看，美国符号学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起源于皮尔斯的符号研究、莫里斯学说的行为主义研究和传统古典语言学研究，经历了逻辑实证结构和社会学以及行为心理学等研究过程，又融合了象征主义和民主政治等概念，最后发展到雅各布森带有语言符号学性质的诗学研究和西比奥克生物符号学倾向的全面符号学研究。从研究内容看，美国符号学研究从研究符号本身到语言符号的意义阐释，从人类的文化符号研究到生物学全领域的探究，当下更是迈向了信息控制、人工智能、宇宙学图示分类等前沿领域，可谓包罗万象，涵盖领域之全面是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难以企及的。

美国符号学人数众多，流派纷繁，但就对世界符号研究的贡献而言，有四位学者功不可没。最重要的当属现代符号学的开创者之一皮尔斯。区别于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皮尔斯更倾向于符号的三元划分，他认为符号并不是被构想为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 (皮尔斯, 2014, pp. 31 – 49) 三者之间不可化的动态三位一体关系，是依据文化语境、习惯、规约等来连接符号与对象的解释行为。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更像是一种科学化的符号学思维，通过将逻辑、感知与行动当作基本的符号现象，让不同的符号系统显示出动态交流的可能，走出了静态的符号文本观，窥探符号的真相和本质问题，使符号学成为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的学科。莫里斯从有机体的行为主义出发，发展了“三个世界”（符形、符义、符用）学说。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雅各布森打通了语言符号学的功能系统。西比奥

## □ 符号与传媒（28）

克创办了符号学会刊，发展了符号学的生物学思维，极大地开拓了全球符号学的视野。

关于俄罗斯符号学思想的研究，该书主要对其符号学思想的起源，各阶段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以及当代符号学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体观照。作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三大中心国之一，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一直以来继承了世界符号学发展的哲学和语言学传统，表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此外还厚植于文化传统，将符号学研究融合进本民族深层文化结构和历史背景中思考。综合来看，由于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内含深刻的文化基因，所以文化符号学成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方向。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大批思想精深、学识广博、影响深远的符号学思想家：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依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小组，在音位学和语法等研究领域的创造性研究在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享有盛誉；什科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和普罗普的叙事结构分析法被广泛探讨；巴赫金的复调式小说和狂欢诗学给思想和文学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洛特曼所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的集大成者，其构想的“第二模式系统”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符号学研究的进程。

总体而言，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不断成长和繁荣的阶段，即形成期（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发展期（十月革命之后到20世纪中叶）、过渡期（主要为20世纪中叶前后的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至1993年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标志着俄罗斯符号学走向成熟。之后，随着巨星的陨落，俄罗斯当代符号学研究呈现出明显下滑和衰落的趋势。另外，有别于美、法两国的符号学研究特征，俄罗斯符号学表现出自身独特的品位，较多偏重于文化和文学符号学研究，重视自身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有效整合，深入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深层来解释符号域的各种外在表现，挖掘了大量有共性的符号学规律，为人文科学之间的交流对话和有机融合提供了可能。

## 四、中国符号学：一条相异于西方的新的学术路径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历史较短，但进步显著。毋庸置疑，中国符号学已然在世界符号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符号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中国的学科，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财富一时打了个盹”（赵毅衡，2012，p.20）。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底蕴深厚，传统的中华文化土壤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符号

学内涵，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深度和广度。诚如《符号学思想论》一书指出，中国符号学不仅有“13个领域”的理论归依，包括易学、名学、训诂学、典故、术数等，而且在多方面展现出独到的学术精神。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十分包容的精神，而且擅长学习和创新，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理论创新。

《符号学思想论》一书对中国符号学的梳理和研究，大体按照四方面思路展开。一是通过典型符号范式、代表性符号学著作来考察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理论构成。中国符号学的理论资源包括易学、汉字和传统名学等。二是围绕符号学中的“中性”这个根本问题展开对中国符号学现状与发展的描述。三是注重对传统符号学资源的发掘与现代符号学思想的梳理及二者的对接。四是讨论和分析了李幼蒸、赵毅衡、王铭玉等学者的代表作，展示了当代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向。这三位符号学名家对符号学都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体认，他们秉着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符号学态度，展开中西符号学对话，探索中国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和适合东方思想的“合治”观念，开创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特色和基本理路。

每个国家的符号学理论都有自身独到的建树，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用比较精简的表达来概括的话，上述国家的理论发展特色可以凝练为：法国是“二元对立”，美国是“三分归元”，中国是“中性合治”，俄罗斯是“文化统摄”。当然这样的概括仅仅是从广义的范畴入手，是就各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论层面论说，并不代表其中每个人都依循这样的路径和模式，并不是绝对的携一语而统全域。当然反过来说也有一些以偏概全的嫌疑和一叶障目的短视，然而正是这些特点概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反思其中的问题，从而面向未来的发展。

西方符号学的发展总体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是一种符号异质化表达的分治立场和坚持符号边界设定的极性思维（王铭玉，孟华，2021，p. 76）。欧洲的符号学研究长久以来一直簇拥在索绪尔传统左右，以他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学派通常都是以语符为中心（或者说是语本位），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正是自古希腊以降盛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诸如现实与思想等二元对立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任意约定的符号关系，因此就将整个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处理为符号学的基本原则，而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去表现种种抽象的图示机制或深层的逻辑规则，意义的表征正是据此在社会生活中建构和循环。可以说，这条路径是在一个封闭的场域内对符号最大化效果的探寻，缺

## □ 符号与传媒（28）

少了思辨的逻辑，最重要的还自动排除了很大一部分非语言的符号，过分强调异质性符号之间的二元区分，试图以形式化的、单一的编码方式来处理整个符号系统。

以皮尔斯为代表的美国符号学研究可谓是西方符号学的第二条路径。皮尔斯的超越之处就是突破了索绪尔的语言框架，扩大了符号的概念，使符号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存在方式，而将符号纳入与其存属范围内的其他事物的开放关系中。他对符号的划分采取三分方式，并且这种三分关系是一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整体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的动态互动上，并且符号的意义就是对解释项的各种回应。皮尔斯区分了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分别代表图像、物象和语言，可以说每个符号的表征都内嵌了三种不同的意指方式。这种动态意指关系是经过逻辑推论的结果，因此，它更多是关注意指一个对象世界时异质符号之间表达效果的区分（王铭玉，孟华，2021，p. 78），让符号语言、图像、物的指示各自归位与自洽。

中国学者在最初接触符号学时对美、法两国的研究各有偏爱，但中国的符号文化底蕴深厚，符号资源丰富，探索出一条相异于西方的新的学术路径是我们长久以来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在吸收借鉴他人的同时表明我们的学术态度与价值观。在对索绪尔模式、皮尔斯模式深入思考之后，中国符号学界认为二者看似不可通约的背后实则存在着内在的二元互补关系，如果从形式与实体的二分出发，索绪尔的结构符号学更侧重形式论，而皮尔斯则多侧重实体论或实在论，因此可以在形式与实体的区别对立中考察二者之间互动互补的中性关系。所以，不妨跳脱出符号学的极性思维，游走在中间地带来思考符号学的另一种表达，是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杨天宇，1997，p. 899）。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也是更适合我们的思维方式，借此，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开始走“居间”路线，赵毅衡的“意义观符号学”，王铭玉、孟华的“语象合治符号学”等皆表现出鲜明的“中性化”色彩，进而也发展出一种“超符号”思维，即弥合和超越诸如语言－言语、形式－物质、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的对立关系，在对立中找到一种同一，实现中性化的处理。当然这并不是刻意寻求两大学派笼统的折中，而是在广义符号的视野下融会中国文化（如阐释、意象等）后的哲学思考。

## 五、结语

总之，《符号学思想论》一书以一种宏大的格局网罗了四大主要国家关

于符号的智慧，厘清了符号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构筑了异质时空下的符号图景，实现了古今中外的符号学跨时空交流与对话。在此过程中，符号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和优化，符号学也逐渐实现从跨学科性迈向跨文化性的新阶段。中国作为符号学发展的璀璨之星，一定会本着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原则厚植本国文化基因和传统，为符号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同时，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路径应该避免故步自封，对东方的符号智慧也不该怀着东方主义的狭隘偏见。相信该书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和批判思考的空间，把符号学研究引向一个不同研究传统相互借鉴的新阶段。

#### 引用文献：

- 卡西尔，恩斯特（2004）. 人论（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李幼蒸（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皮尔斯（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索绪尔，弗迪南·德（2005）.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铭玉（2004）. 语言符号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铭玉（2021）. 符号学思想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铭玉，孟华（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 当代修辞学，4，76–78.
- 杨天宇（1997）. 礼记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俞建章，叶舒宪（1988）. 符号：语言与艺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2）. 正在兴起的符号学中国学派（代编者按）. 贵州社会科学，12，20–21.
- Buchler, J. (Ed.). (1955).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999).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J. Buchler, E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作者简介：

刘利刚，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导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符号叙述学、跨媒介修辞与传播。

#### Author:

Liu Ligang,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diting and Directing Depart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 narratology,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across media.

Email: llgtianshui@163.com